仪式、艺术与身体：商河鼓子秧歌的文化阐释与传播价值研究

于淼[1]

(1.西北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00)

摘 要：商河鼓子秧歌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鲁北地区标志性民间舞蹈之一。本研究以仪式性、艺术性、身体性为核心维度，解析其文化内核。秧歌的身体实践承载着民众对力量的崇拜与生命礼赞，是地域认同的具身化表达。在当代社会，其原生祭祀、年节仪式场域逐渐弱化，但经符号重构，仍承担着社区凝聚功能。从传播层面看，鼓子秧歌视觉冲击力强，在文旅融合与新媒体传播中具备独特优势，但也面临原生语境抽离、身体技艺舞台化、标准化等挑战。研究认为，维系其文化本真性的关键，在于保持“仪式—艺术—身体”的结构完整，在传承核心基因的前提下，平衡传统形态与当代传播需求。

关键词：商河鼓子秧歌；仪式性；艺术性；身体性

DOI：doi.org/10.70693/202610161417

Ritual, Art, and the Body: A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and a Study of the Dissemination Value of Shanghe Drum-and-Dance Yangko

Yu Miao[1]

1.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000, China

Abstract: As a national-leve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Shanghe Drum-and-Dance Yangko is one of the iconic folk dances in northern Shandong. This study takes ritual, artistry, and corporeality as its core dimensions to analyze the dance’s cultural essence. The bodily practices of Yangko embody the community’s veneration of strength and celebration of life, serving as an embodied expression of regional identity.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its original contexts of religious rituals and festive ceremonies have gradually diminished; however, through symbolic reconstruction, it continues to play a role in fostering community cohesion. From a communication perspective, the visual impact of Drum-and-Dance Yangko gives it unique advantages in cultural–tourism integration and new-media dissemination, yet it also faces challenges such as the detachment from its original context, the theatricalization of its physical techniques, and standardization. This research argues that maintaining the structural integrity of the “ritual–art–body” triad is crucial for preserving its cultural authenticity. On the basis of safeguarding its core cultural elements, it is necessary to strike a balance between traditional forms and contemporary communication needs.

Keywords: Shanghe Drum-and-Dance Yangko; rituality; artistry; corporeality

作者简介：于淼（2002-），女，硕士，研究方向为文艺与文化传播。

商河鼓子秧歌以雄浑鼓乐、刚劲舞步和恢弘阵式著称，被视为北方汉族男性舞蹈的典型形态。当地俗称“跑十五”，在每年元宵节时段展演，集歌舞、扮饰、阵列于一体，是区域性年节民俗活动的主要形式。2006 年，商河鼓子秧歌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其历史与文化价值得到正式确认。

当前，受城镇化推进、传承人老龄化、传统仪式场域缩减等影响，秧歌的原生传承环境持续收缩。在舞台化、赛事化改编中，其原有的仪式内涵与身体技艺也出现简化、符号化等问题。既有研究多侧重历史梳理、形态记录与保护对策，对其“仪式行为—身体艺术—文化符号”的整体性结构阐释不足，对当代传播价值的系统研究仍较薄弱。

本研究以“仪式—艺术—身体”为思路，解读商河鼓子秧歌的文化构成与传播逻辑，探寻其活态传承路径，为非遗保护与传播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参考

1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1.1 从描述到阐释的商河鼓子秧歌研究

早期研究（如《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山东卷》）[1] 对商河鼓子秧歌开展了基础性整理，完整记录其源流脉络、角色构成（鼓、伞、棒、花、丑）、典型动作（蹲扑步、劈鼓子）、伴奏曲牌与常用阵式（十字街、八卦连环），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可靠的资料框架。非遗保护工作推进以来，研究重心转向传承实践与对策路径。（张涵硕，2024）[2]，围绕传承主体断层、校园传承模式、数字化记录与传播等现实议题，分析当前保护工作的重点与难点。在艺术价值探讨上，研究者（赵彤彤，2024）[3]多聚焦其“以圆为美”的审美特质及地域风格成因。部分学者（刘晓真，2012）[4]将研究拓展至社会文化领域，揭示秧歌与乡土社会结构、春节礼俗、民间信仰之间的关联，为仪式属性研究提供了初步方向。

1.2 仪式理论解码秧歌的文化逻辑

人类学理论为解读商河鼓子秧歌的仪式属性提供了关键分析路径。范热内普提出的 “过渡礼仪” 模型指出，人类仪式普遍遵循“分离—阈限—聚合”的三段式结构[4]。维克多·特纳在此基础上深化了对阈限阶段的解释，认为阈限状态下日常社会结构暂时悬置，群体内部易形成平等交融的共同体经验；其“社会戏剧”理论进一步揭示，仪式能够调解社会矛盾、修复社区秩序[5]。

借助这些理论，我们可对商河鼓子秧歌展开审视：其传统的“串村”表演是否构成一套完整的仪式进程？其中蕴含着哪些阈限体验与社会整合功能？鼓、伞及特定阵图等核心符号又承载着怎样的宇宙观或社会隐喻？

1.3 身体理论打开秧歌的意义之门

身体并非仅是舞蹈的工具，更是意义生产与文化铭刻的场域。梅洛庞蒂的“具身化”哲学认为，身体是人类感知和理解世界的基础[7]；皮埃尔·布迪厄的“惯习”理论则强调，特定社会文化环境会塑造出持久且可迁移的身体倾向与行为模式，身体由此成为社会结构内化的载体[8]。在舞蹈人类学领域，学者们关注“身体技术”的习得与传承，以及舞蹈如何借助身体动作、韵律与空间运用来表达情感、身份与世界观。 运用这一视角审视商河鼓子秧歌可见，其“蹲扑”“抡臂”等刚猛有力的动作，绝非单纯的技术呈现，更可能是鲁北农耕民族力量崇拜与坚韧品格的具身化表达，是特定地域“惯习”的体现。而身体在集体阵图变换中的协同配合，亦在建构着社区的秩序感与凝聚力。

2 仪式场域中秧歌的文化根脉与神圣维度

2.1 传统仪式进程

商河鼓子秧歌的核心精神植根于鲁北传统仪式体系，其源流与当地农耕祭祀、自然崇拜及祖先信仰深度绑定。古代官方以祭祀礼俗维系社会秩序，而鲁北乡村礼俗则由族长主持，于正月初七在祠堂、寺庙举行祭神拜祖仪式，伴以渔、读、耕、樵类程式化表演，仪式氛围肃穆庄重。元末明初，外来移民迁入带来多元文化，推动商河鼓子秧歌形成丰富的艺术形态与表演特色。其核心表演场域传统上紧扣农历春节，形成一套富含象征的仪式进程：

1.“起秧歌”与请神：表演前，常在本村祠堂或特定场地举行简单仪式（如焚香、叩拜），以示对祖先或神灵的敬意，宣告脱离日常秩序。

2.“串村”行进：秧歌队按既定路线前往邻村表演。行进本身具有巡游、驱邪的象征意义。队伍前列的“探马”负责联络、开路，维持仪式空间的秩序。村口相遇时的特定礼节（如互致问候、阵图展示），强化了村际联系。

3.场地表演：在对方村落的开阔场地（如打谷场）进行核心表演。鼓，其声如雷，传统上被

认为能驱邪避祟，沟通天地人神，是力量与秩序的象征。伞不仅是领舞标志，更隐喻着庇护、权力或天穹。严谨变换的阵图（“力杀四门”、“八卦连环”等），不仅是视觉艺术，更可能模拟宇宙秩序、军事布阵或象征祛除邪祟的“法力场”。角色扮演暗含社会角色分工与和谐理想。此刻，日常等级暂消，社群在鼓声舞步中融为一体，体验着特纳所说的“共睦态”。

4. 收场与回村：表演结束，接受东道主馈赠（烟糖等），有序离村。回村后可能再次简单致谢神灵祖先，标志仪式完成，回归日常。这一完整进程，清晰地体现了范热内普的过渡礼仪模式，其核心功能在于：通过集体展演祈福禳灾、强化社区认同、调节村际关系、宣泄情感、迎接新春。

2.2 当代仪式场域变迁与调适

城镇化进程中，商河鼓子秧歌依托春节串村的传统祭祀语境不断弱化，以驱邪、祭祖为核心目的的原生表演场景持续缩减，但其仪式性并未消失，而是发生了结构性转化。在表演层面，舞者依托鼓、伞、道具与传统动律，以身体叙事完成情感表达与精神释放，替代了原有的祭祀宣泄功能。其社会功能转向文化整合与公共娱乐，文化节、非遗展演、赛事成为主流展演空间。鼓、伞、阵图等核心符号的宗教内涵逐渐淡化，转而成为地域文化认同、集体力量与团结精神的文化标志。现代展演通过规范流程、强化仪式氛围与公众参与，重构了当代仪式感，延续了其凝聚社群的文化作用。理解仪式维度的这种存续与转化，是把握鼓子秧歌文化精髓的关键所在。

3 身体实践：技艺、情感与认同的具身化

3.1 身体技艺：力量与控制的锻造

秧歌的核心魅力在于其独特且高要求的“身体技术”。“鼓子”以“蹲”“跳”“转”为根基，这是对舞者的下肢力量、核心稳定性、爆发力及耐力要求极高。正如老艺人所言：“没三年功夫，练不出‘沉’劲和‘狠’劲。”这种“沉稳健硕”的体态，正是鲁北农耕民族坚韧、有力、务实精神的直接体现。 “伞头”的掌控同样关键。执伞者需引领全队完成复杂阵图，其旋转、顶压、拧身等动作，对平衡感、空间方位感与身体协调性要求严苛，而伞的舞动亦是权威与智慧的象征表达。 鼓子秧歌技艺传承依赖师徒口传身授与长期身体练习，通过反复模仿、纠正与肌肉记忆累积，将动作模式、发力方式及节奏感内化为“习惯”，这一过程本身即是身体规训与文化内化。

3.2 身体叙事：情感与象征的表达

身体在商河鼓子秧歌中绝非简单的机械运动，而是承载着丰富情感与文化意涵的叙事媒介，每一个姿态、每一次律动都在诉说着深沉的集体记忆与生命体验。

情感共振的力量在秧歌表演中体现得尤为震撼。鼓子们整齐划一、雷霆万钧的跺地、扑跃、抡臂，直观地宣泄着豪迈、奔放、欢腾甚至抗争的集体情绪。鼓点的急促与舒缓、身体的刚劲与灵动形成奇妙的呼应，当数十名舞者的动作与鼓点严丝合缝时，便会产生排山倒海的情绪冲击波，形成强大的情绪感染力，使舞者与观众沉浸于一种激昂亢奋的集体氛围中。

特定身体姿态与动律蕴含文化密码。“蹲扑步”的沉稳象征扎根土地的坚韧，向上腾跃隐喻生命勃发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尤为显著的是群体动作的高度一致：数百人步伐与姿态统一，其撼人力量不仅是表演默契，更是集体主义精神的肉身宣言。

此外，男性角色（鼓子、伞）的刚猛主导与女性角色（花扇、彩绸）的灵动辅助，悄然映射传统社会性别期待，使身体成为文化规范的鲜活载体。

3.3 身体经验与地方认同

参与商河鼓子秧歌，绝非简单的技艺展示或娱乐活动，而是一场深刻的身体实践，它像一条无形的纽带，将个体与这片土地紧密相连，在日复一日的舞动中，悄然塑造着强烈而独特的地方认同感。

对于本地人，尤其是参与者而言，掌握秧歌技艺、参与集体展演，是将“商河人”身份内化于身体的过程。那种独特的发力方式、节奏韵律、集体舞动的热血沸腾感，成为区别于他者的身体标记。

身体记忆与归属感，则在时光流转中沉淀为情感的锚点。秧歌活动（尤其是童年参与的记忆）构成重要的“身体记忆”。这种记忆与特定的乡土气息、乡音、节庆氛围紧密相连，成为个体情感结构中关于“家乡”的核心组成部分，滋生出深厚的文化归属感和自豪感。身体，成为了地方文化认同最直接、最感性的载体。

4 艺术维度：形式之美与价值呈现

4.1 形式美的核心要素

刚劲雄浑的舞蹈风格是其最鲜明的艺术标签。以男性“鼓子”为主体的舞蹈，动作强调“蹲、扑、抡、跺”，发力刚猛，幅度开阔，重心低沉，步伐扎实，展现出一种顶天立地、不可撼动的阳刚之美和力量之美。这种风格迥异于南方秧歌的柔媚或胶州秧歌的灵巧，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地域辨识度。

顾名思义，“鼓子秧歌”自然少不了“鼓”。鼓是秧歌的灵魂。观众欣赏鼓子秧歌，无不为其伟岸气质和英雄气势所折服，大有跃跃欲跳之感。鼓和其他乐器相配合，敲出的鼓点准确，节奏鲜明，鼓声隆隆，可谓是震耳欲聋，在整个舞队边沿过程中，鼓点贯穿前后，带动舞者的舞姿和气氛，表现出山东大汉的那种气势磅礴，强健有力[9]。舞者的跺地、扑跃、抡臂等动作，皆与鼓点严丝合缝，形成铿锵有力、引人激昂的韵律感。这种节奏不仅作用于听觉，更借由舞者的身体，强烈地传递至观者的视觉与体感层面，展现出旺盛的生命力。

秧歌的阵图是其艺术性的集中体现。俗话讲“跑大圆，绕驳花，文武场子一笔画”，阵图千变万化，但多是围场跑圆，如同卷心菜。驳花意谓转身绕圆，复杂场图中驳花的数目难以看清，整个场图永远在流动，杂而不乱。外部围中跑圆，内部转身绕圆，中间偶尔变有“八趟街”的方阵，散发外圆内方的儒学特征。鼓子秧歌涵盖的一百零八种场图，便体现着古人天圆地方的宇宙认识观。

角色装扮（鼓子的头巾、彩带、健壮的体魄；伞头独特的服饰和罗伞；丑角的滑稽扮相）、道具（鼓、伞、棒）以及色彩运用（传统上多浓烈饱和的原色），共同构成了一套质朴、粗犷、富有乡土气息和象征意味的视觉符号系统，强化了艺术表现力。

4.2 多元价值的艺术承载

鼓子秧歌独特的舞蹈语汇、阵图、角色配置、表演程式，是研究鲁北地区乃至北方汉族民间舞蹈发展史、民俗变迁史的“活态标本”。通过其艺术形式，可以窥见历史上的社会生活、信仰观念和审美趣味。

鼓子秧歌具有一种独特的审美体验——力量之美、阳刚之美、秩序之美、群体协作之美、生命律动之美。其粗犷豪放的美学风格，在当代艺术多元化的背景下，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和震撼力。

作为文化符号，它是鲁北地域文化的核心代表和重要载体。其艺术形式中凝聚着当地民众的宇宙观（如阵图可能暗含的秩序观）、价值观（如崇尚力量、集体协作）、精神气质（如坚韧、豪爽、乐观），是地域文化认同的直观体现。

鼓子秧歌集体性、参与性强的艺术形式，本身就是社区凝聚和社会整合的有效机制。组织排练、共同表演的过程，强化了村民之间的联系、合作精神和集体荣誉感，对维护乡土社会和谐具有积极作用。其作为节庆艺术，也极大地丰富了民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5 当代传播策略

5.1 传播挑战

首先是仪式语境的剥离。舞台化、赛事化、旅游表演往往脱离其原生的春节“串村”仪式场域，导致其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精神价值被简化为视觉奇观或竞技项目，内在意义难以被观众深刻感知。

其次是身体技艺的标准化与简化。为追求舞台效果或便于教学推广，可能导致部分高难度、体现核心力量风格的身体技艺(如极致深蹲的“扑步”）被简化或标准化，削弱其身体表达的独特性与震撼力。

再一个是传承群体老龄化与断层。核心技艺掌握者年龄偏大，年轻一代因生计、兴趣等原因，难以长期投入艰苦训练，高水平传承面临后继乏人的隐忧。

还有新媒体传播的浅表化。短视频易于传播片段化、高潮化的视觉内容(如震撼的阵图变换)，但难以承载其完整的仪式过程、历史背景和深层文化阐释，可能导致片面理解。

最后是文旅开发中的同质化与过度商业化风险。如何在旅游表演中避免流于形式，保持艺术水准和文化深度？如何防止文创产品设计低劣、脱离文化内核？需警惕对文化本真性的侵蚀。

5.2 传播策略

第一，要坚守本体，深度阐释。在各类传播活动中，必须同步进行深度文化解读。利用字幕、解说、纪录片、线上文章、VR/AR 导览等形式，讲清其仪式渊源、身体技艺的独特价值、阵图符号的象征意义、蕴含的精神内核，引导观众超越“看热闹”，实现“看门道”。在文旅项目中，设计融入文化讲解的深度体验环节。

传承与传播工作必须以保护其核心身体语汇和刚健雄浑的总体风格为前提。避免为迎合舞台或降低难度而过度简化、柔化动作。建立更科学的训练体系，平衡技艺传承与身体保护。

第二，要创新表达，拓展渠道。在文旅场景中，突破简单舞台表演模式。尝试在传统村落空间或仿古街区中，结合声光电技术，部分复原“串村”仪式感，设计包含起秧、行进、场地表演、互动等环节的沉浸式体验项目，并巧妙嵌入文化解说。商河鼓子秧歌的发展应充分利用现代多媒体的优势，使信息在整个“媒介语境”下得以共享[10]。制作系列化、主题化的中短视频或直播，系统介绍其文化内涵。发起线上话题、直播连线老艺人、开发互动性小程序。

构建线上社区，利用社交媒体群组，连接爱好者、研究者、传承人，促进交流与知识共享。要深化教育传承，培育未来受众与传承者。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不仅可以提高鼓子秧歌采集、保存及建档的效率，利用声像信息数码化，可以将动作技术展示、技术讲解等重要要素进行快速且高质量的收录，还能增加鼓子秧歌的社会关注度，以期达到更好的宣传与推广效果。

第三，要构建协同机制，激发内生动力。鼓子秧歌作为商河县体育非遗的重点保护项目，政府部门在推动非遗项目进校园过程中，应从实际出发，整合政府部门间的资源，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协同参与。应支持乡村或社区在传统节庆中恢复和开展秧歌活动，为其提供必要资源，包括场地、小额资助及老艺人指导等，这是维系其文化生命力的根本土壤。

要支持有影响力且善于表达的代表性传承人走向公众视野，通过媒体、讲坛及新媒体平台讲述秧歌故事，提升公众关注度。旅游开发项目必须坚持文化优先、品质至上的原则：表演团队需保持高水平，避免敷衍了事；文创产品设计应深入挖掘文化元素，追求美学品质与文化内涵的统一，杜绝低劣同质化产品。此外，还应探索“非遗+研学”“非遗+民宿”等深度体验模式。

6 结论

商河鼓子秧歌并非单纯的民间舞蹈表演，它承载着鲁北平原的厚重历史记忆，凝聚着乡土社会的精神气质，是身体、艺术与仪式交融共生的文化生命体。本研究通过“仪式—艺术—身体”三维视角，旨在穿透其外在形式，揭示内在的文化逻辑与价值核心。正是这三者的深度交融与相互建构——仪式赋予灵魂，艺术展现魅力，身体实现传达——共同构成了商河鼓子秧歌不可替代的文化基因，而这一基因亦是其在当代社会彰显多元传播价值的根基。

但其传播与传承过程面临诸多阻碍。仪式语境的抽离、身体技艺的可能简化、传承群体的断层、新媒体传播的浅表化、文旅开发中的同质化风险等，均对其文化本真性与可持续发展构成挑战。破解这些难题的关键，在于实现坚守本体与创新传播的辩证统一。

参考文献

[1]商文.商河的鼓子秧歌[J].台声,1996,(1):52.

[2]张涵硕.现实困境与纾困之道：商河鼓子秧歌民间传承状况的调查研究[D].哈尔滨体育学院,2024.

[3]赵彤彤.山东鼓子秧歌中“圆”文化的审美体现探究[D].山东师范大学,2024.

[4]刘晓真.走向剧场的乡土身影--从一个秧歌看当代中国民间舞蹈[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12.

[5]梁宏信.范·热内普“过渡仪式”理论述评[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26(04):98-103.

[6]陈建军.维克多·特纳的社会戏剧[J].九江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43(03):100-105+111.

[7]代福平.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启示下的具身化体验设计思维初探[J].创意与设计,2020,(01):20-24.

[8]李全生.布迪厄场域理论简析[J].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02):146-150.

[9]黄锐.秧歌传说,共舞商河——探讨商河鼓子秧歌的特点及发展[J].大众文艺,2014,(05):38-39.

[10]王正伟.传播学视域下山东商河鼓子秧歌的价值开发与传承[J].文物鉴定与鉴赏,2022,(16):166-169.

[11]李卓玲,路帅.商河地区山东鼓子秧歌形态流变与民俗文化互构关系[J].山东艺术,2023,(04):79-86.

[12]刘晓真.从乡俗仪礼到民间艺术——当代山东商河鼓子秧歌文化功能的变迁与传承[J].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04,(01):77-81.

[13]李莹.论汉族民间舞蹈的传承与创新——以商河鼓子秧歌为例[J].戏剧之家,2023,(04):136-138.